

财富货币化下的币权垄断与财富集中^{*}

——兼论央行数字货币体系的影响

卢 荻 张 权^{**}

【摘 要】当代财富货币化加剧“货币掩盖真实劳动关系”的异化,信用美元体系借“美元-美债”环流在国际上虹吸全球财富、在国内激化阶层分化,而加密货币的“去中心化”叙事难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规训,其自身反沦为新型垄断。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底,沿着“历史演进规律—当代现实矛盾—未来技术革新”的脉络展开研究;首先梳理财富从产品、商品到货币、资本的演进逻辑,揭示信用体系成为资本主义财富积累修复机制的过程;继而从制度、技术、地缘维度解构美元体系“中心-边缘”秩序及其危机,剖析币权集中的阶级本质与加密货币悖论;最后探讨央行数字货币(CBDC)重构币权秩序的潜力,考察全球实践的瓶颈及美国政策转向的影响。本文认为,CBDC为打破币权私人垄断提供可行路径,并据此提出社会主义的CBDC治理路径——公有制主导关键基建、技术赋能共同富裕、多边合作破美元定价垄断,为区块链时代全球数字货币治理提供兼具社会主义属性与实操价值的方案。

【关键词】财富分配;货币权力(币权);货币理论;央行数字货币(CBDC)

一、引言

国际货币体系正在经历深刻变革。俄乌冲突后美欧对俄的经济金融制裁

^{*} 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球制度比较视野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24&·ZD014)资助。

^{**} 卢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张权(通信作者),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与前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联合培养博士后,E-mail: zhangquan0406@163.com。

引文格式: 卢荻,张权. 2026. 财富货币化下的币权垄断与财富集中——兼论央行数字货币体系的影响[J]. 政治经济学季刊,5(1):31-50.

Cite this article: Lo D, Zhang Q. 2026. Monopoly of currency power and wealth concentration under the monetization of wealth: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impact of the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system[J]. Political Economy Quarterly, 5(1): 31-50. (in Chinese)

加速了全球南方“去美元化”进程,美国国内亦出现“回归金本位”的政治诉求,折射出信用美元体系的深层危机,其本质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金融领域的集中爆发。与此同时,本届美国政府关于稳定币的积极态度引发大众对技术变革的想象——加密货币是否如其宣传的那样将带来币权结构的“去中心化”?

对货币加剧财富不平等的质疑是货币再次成为争论焦点的重要因素。以大规模货币投放的量化宽松政策为典型,在美联储开启无限量化宽松一年半后,福布斯榜单于 2021 年 10 月披露“最富有的 400 位美国人”的总资产较上年增长了 40%,而同期美国 GDP 增长率仅为 2.3%。实际上,在美联储 2008 年首次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后,学术界围绕量化宽松政策是否加剧财富不平等展开了激烈争论,认为量化宽松可能通过资产组合、收入构成等机制影响财富分配,但对政策的总体影响未能形成统一结论。在此问题上,新古典经济学暴露其范式缺陷:认为货币仅透过价格间接参与生产,似乎财富积累只能依托储蓄的积累,以至于无法揭示“币权垄断导致财富集中”的颠倒性积累逻辑。

相反地,马克思的理论区分了货币的一般理论和资本主义的货币理论,将货币信用结构深深嵌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之中,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货币现象提供了深刻洞见(Ivanova, 2020)。一些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财富与货币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王湘穗(2009)认为,在当代世界,货币权力是“通过控制金融资本去影响世界经济体系运行和利益分配的权力”,由国家(联盟)和世界性金融机构共有;张健(2011)以哲学视野分析了后工业社会在财富内涵上的重大转变,指出对交易的定价权是富国攫取财富的重要力量;张捷(2014)通过分析西方崛起的历史得出,定价权就是财富分配权和占有权,而对金融资本和流动性的掌控是定价权的关键。

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底,沿着“历史演进规律—当代现实矛盾—未来技术革新”的研究脉络,阐明金融垄断资本通过货币安排集中全球财富的机理及本质,为区块链背景下的社会主义金融创新提供分析框架和政策建议。本文后续部分结构如下:首先,从财富形式的历史演进切入,梳理从产品财富、商品财富到货币财富、资本财富的演化逻辑,剖析信用体系如何逐步成为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核心修复机制,为后续分析奠定理论基础;其次,以信用美元霸权为对象,从制度、技术、地缘三重维度,分析其“中心—边缘”货币秩序的构建路径,揭示该体系在国际层面虹吸全球财富、在国内层面加剧阶层分化的双重效应;再次,揭示币权集中内嵌于阶级统治需求且受私有制制约的本质属性,并指出加密货币“去中心化”叙事的表象下,其技术架构仍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规训,最终只会形成新型资本垄断;然后,重点探讨央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简称 CBDC)重构币权秩序的潜力,分析其技术特性对货币主权的强化作用,考察全

球主要经济体实践特征与共性瓶颈,并剖析美国数字货币政策转向对美元霸权的双重影响;最后,则立足中国实践,提出以公有制主导数字人民币基础设施建设、以技术赋能共同富裕、以多边合作突破美元定价垄断的社会主义数字货币治理路径,在技术理性与制度创新的辩证统一中筑牢货币权力的人民立场。

二、财富形式演进与信用货币体系对财富分配的改造

现今,人们习惯将财富折算成货币,用货币换取财富,似乎财富就等同于货币。回顾经济史可知,如果将货币视为一种生产关系,那么货币仅仅是财富的一种社会形式。在资本主义时代,商品是财富的另一种社会形式。资本主义财富规律的展开有赖于商品与货币之间的矛盾运动。

(一) 马克思视角下财富形式的历史发展

财富形式的演变是理解生产关系变迁的核心线索。《资本论》开宗明义,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马克思和恩格斯,1972,p.47),这一论断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财富的物质载体,更确立了唯物史观关于财富问题的分析范式。从原始社会的生存资料到当代资本主导的财富体系,生产关系的每一次重构都伴随着财富形式的质变。

在自然经济阶段,财富最初以天然产品和劳动产品的形态存在。产品财富满足人类“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1960,p.23)这一历史前提。随着生产方式从渔猎、农耕向机器大工业演进,财富形式不断突破自然条件的限制,但始终保持着“使用价值”的本源属性。商品经济的出现推动经济形式从“为直接消费而生产”转向“为交换而生产”,商品财富成为典型形式。商品经济使“人对人的直接依赖性”转化为人对“物的依赖性”(马克思和恩格斯,1979a,p.104),不仅改变了生产目的,更使财富从满足生存需要的工具转化为支配社会关系的权力载体。

随着贵金属等特殊商品从商品世界中独立出来,货币财富成为财富的一般形式,“一般财富本身集中地表现在一种特殊的物质上”(马克思和恩格斯,1979a,p.169)。这种集中化使财富从具体使用价值转化为抽象交换价值,将具体劳动转化为无差别的抽象劳动。货币不仅是交换媒介,更成为价值贮藏手段,成为支配社会再生产的权力符号。进一步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货币更多地以资本的形式存在,表现为具有“自我增殖”属性的资本财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被掩盖,社会生产关系走向全面物化。

从产品到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财富承载着特定社会关系中的权力结

构:产品维系生存关系,商品构建交换关系,货币确立流通关系,资本支配生产关系。这种演变适应了生产力发展,也加剧了社会关系的异化。在当代全球体系中,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特殊地位,正是这种财富形式演变的现实投射。

(二) 资本主义的两种财富规律及其限制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进中,商品与货币的对立,既是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这一商品经济基本矛盾的必然外化,更反过来推动着该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不断深化与展开。

1. 基于商品生产的财富规律及其限制

商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四个环节最直接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刻画了资本主义财富创造、分配及积累的基本面貌:工人获得工资用于劳动力再生产,产业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用于扩大再生产,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与产业资本一起分割剩余价值。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提出资本积累一般规律时,出于简化目的,假设商品得以按照其价值售出,且不考虑信用体系的参与,假设产业资本家独占剩余价值。在这一设定下,产业竞争推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与技能门槛的下降,进而造成无产阶级相对过剩。这种人口规律既强化了对劳动力的剥削,也加速了资本集中,最终导致财富两极分化和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

马克思实质上揭示了一种基于商品生产的财富规律:产业资本购买劳动力获得剩余价值,社会财富的增长表现为生产资料及商品规模的增长,本质是物化劳动的积累。这些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产业资本家手中,最终周期性地导致生产过剩、资本过剩和社会财富的大规模贬值。资本需要找到其他途径维系积累。

2. 基于信用体系的财富规律及其限制

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勃兴,根植于资本周转的时空矛盾,它脱胎于商品生产,却又逐渐形成自己的体系。“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马克思和恩格斯,1974,p.499),当银行信用与商业信用交织成网络,金融体系孕育而生,跨时空的价值交换成为常态。票据贴现、股票发行等金融工具使未来剩余价值提前资本化,借贷资本由此衍生出虚拟资本。虚拟资本虽不参与价值创造,却通过对剩余价值索取权的证券化与极强的流动性,形成不同于商品生产的财富规律。

这一财富规律依托信用体系而运转。信用体系将此处和彼处、过去和未来的价值集中到一起,谁掌握了信用的分配权,谁就掌握了价值的定价权,从而掌

握了财富分配的优先权。虚拟资本的价格只反映一种幻想的、尚未实现的虚拟价值,其涨落表面上仅取决于预期收益和利率,实际上由市场结构、交易规则、资金流向等结构性因素决定,结果是,在资产阶级经济中,金融垄断资本掌握价值的定价权,在财富分配中具有更大优势。

随着全国统一的金融市场以及由各国金融市场联结而成的国际金融市场的相继形成,基于信用体系的财富规律能够支配更大范围的商品生产活动,集中更大规模的财富,但仍然无法避免周期性的生产过剩与价值实现危机,且危机越来越多地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呈现。

(三) 信用本位下财富积累修复的关键场域

既然两种财富规律都无法从根本上避免财富的周期性贬值,应对危机就成了维系财富积累的关键。在危机爆发前夕,由于各个资本家都会选择尽可能多地保留货币,而非信用、商品或生产资料等其他资产形式,市场上出现货币和信用供给的短缺,从而导致危机的蔓延。

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中央银行提供基础货币的依据是它的贵金属储备。一旦基础货币是可兑换的,那么建立于基础货币之上的信用货币在原则上也是与黄金挂钩的。但黄金的开采进度很快便落后于经济的指数式增长,整个货币与信用体系中流通的货币所代表的黄金数量大大超过了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导致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对整体经济的波动异常敏感,尤其是在恐慌或者危机的阶段,一个相对于整个经济体流通中的货币量微不足道的黄金储备的变动就可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反倒是在最需要货币和信用的时候,中央银行的手脚被整个制度体系束缚住了,在货币政策上变得无计可施。

在信用本位制度下,中央银行在发行基础货币时不受储备金的制约,因而获得了更大的裁量权。这份权力的意义在于,经过繁杂的规则及制度建构,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应对,现在可以由一个小团体来决定了。危机——至少表面上——可以通过央行向市场注入更多的流动性得到缓解,但却对财富分配产生显著效应:央行在危机时期购买哪种资产、谁的资产、购买的单价和数量如何,都是一个社会财富的再分配问题,谁最先拿到流动性,谁就能在价格普涨前重新配置资产。当代美元体系下,这种效应尤为明显。

三、信用美元体系下财富集中与币权集中的镜像关系

当代美元体系的核心资产是美元与美债,前者以美联储信用为背书,后者以美国政府信用为背书。数十年来,经过人为设计和多次补充修改拼凑,美元

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货币环流规则和基础设施。在国际货币体系的金字塔结构中,美元处于塔尖地位,其他央行的外汇储备中接近一半为美元。美联储控制着全球流动性的阀门,而金融垄断资本掌控着美联储。

(一) 信用美元霸权的体系建构: 制度规训、技术垄断和地缘压制

信用美元本位的确立标志着国际货币权力从“物质锚定”向“制度霸权”的历史性跃迁。这一过程绝非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经过人为设计和多次补充修改拼凑,逐步构建起具有强制性的全球支配体系:在制度维度上通过制度性安排重构资本流动秩序,在技术维度上依托金融基础设施垄断全球价值流动,在地缘维度上运用区域性危机实现权力再生产。

在制度维度上,通过国际石油机制重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资本流动秩序。英国体系下的货币转型经验在美国体系中得到继承和创新(阿里吉, [2010]2022, pp. 353-354):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双挂钩”制度,本质是通过将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构建起“中心-外围”的币权结构。在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通过与沙特(时为第一大石油出口国)签订涵盖军事、贸易、投资等多个领域的一系列协定,尤其是允许产油国盈余的美元资金投资美国资本市场的政策,促成沙特将美元作为其石油计价及交易的唯一货币,进而推动欧佩克接受该协议,实现美元地位的再次巩固(管清友和张明,2006;徐孝明,2010)。这种机制创新使美元摆脱贵金属储备的约束,转而通过控制全球关键资源的计价权和定价权,将美元制度安排深深嵌入全球资本主义生产网络之中,维持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

在技术维度上,垄断国际金融基础设施,掌控全球流动性分配,实现全球定价。金融产品通常以契约的形式运作,需要基于一定的法律实体,因而需要依托具体的法律环境,以及从事契约谈判、执行、监督等相关工作的组织机构的参与。换言之,全球金融网络不是一种抽象的力量,而是具体的组织体系,并呈现明显的等级制结构,处于核心地位的节点决定了流动性的分配(Haberly and Wójcik, 2015a)。全球金融网络的软硬件基础不断巩固和强化了对流动性的分配权:硬件上,伦敦和纽约两大金融中心的银行业合计处理了全球近六成的外汇交易(Demski et al., 2022),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和纽约商品交易所借助跨境并购掌握了全球农产品、能源产品和贵金属等大宗商品的定价权(邵运文和周宇, 2024);软件上,承担跨境资本流动枢纽作用的离岸金融中心,表面上实现了司法独立、免受管制,实际上仍受到纽约、伦敦等在岸金融中心的遥控(Haberly and Wójcik, 2015b)。这种基础设施垄断实质是资本积累空间修复的新形态——跨国资本通过离岸司法管辖区突破民族、国家、地区疆界,在法律套利中

实现对全球剩余价值的攫取。

在地缘维度上,持续打压竞争性货币体系,不断巩固美元的核心地位。从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中可以窥见美元资本如何制造区域金融危机,通过打击竞争性货币使美元体系获益。早在2001年,高盛借助“金融创新”帮希腊伪造财政数据,使其得以正式加入欧元区(丁一凡,2012)。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有关希腊政府偿债能力的各种负面消息不胫而走,华尔街信用评级机构集体下调希腊债务评级,引发希腊财政资金链断裂,借新还旧的策略难以为继,希腊政府最终以主权资产和未来税收偿债。希腊债务违约也对欧元区其他国家造成冲击,迫使欧盟成员国通过内部协调救济止损,防止债务危机加剧欧元的震荡。实际上,种种数据表明,当时美国的债务问题比欧洲的情况要严峻复杂得多(李稻葵,2011)。然而,正是得益于金融霸权,美元资本可以通过做空其他货币,将他国财富纳入美元体系,同时也转嫁了美国国内的危机。

中心国家的金融资本通过货币机制,将危机成本转嫁给外围国家的产业资本与劳动者,这种剥夺性积累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积累的核心机制之一。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财政部与美联储联合实施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正是凭借货币权力强力干预财富分配的典型事件——金融资本集团通过政治游说获得央行流动性支持,实质是将社会财富通过货币机制向特定群体转移。中央银行已然从传统的“最后贷款人”角色转变为“最后做市商”(Buiter and Sibert,2007),其政策选择直接影响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财富规律。

(二) 信用美元体系的币权集中与财富分配危机

现行美元体系下,美国可通过增发美元偿还债务,形成“美联储发行美元→美国购买外国商品与资产→顺差国置换美债(→美联储发行美元)”的闭环^①。一方面由于股票、商品交易的市场规模相对于外汇交易的规模更小,且美国对外国投资者购买美国资产的种类和数量有严格管制,另一方面由于巴塞尔协议在银行监管上对美债赋予的特殊地位,主要的贸易顺差国(中国、日本、德国等)被迫将美元外汇大量置换成美债。美元-美债国际环流带来的最直接效应便是持续低成本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只要美元继续维持货币体系中心地位,美债便能找到销路;只要美债继续绑定美元,市场便可认定美债违约风险极低。美元-美债国际环流所产生的成本首先由贸易顺差国买单,后者因此遭受通货膨胀冲

^① 在2008年首次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之前,美联储发行美元时购买的债券主要是美债;2008年至2014年的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期间,除购买美债外,美联储还购买了大量的联邦机构债券和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2020年至2022年的量化宽松政策期间,美联储将资产购买范围进一步扩充至公司债。由此可见,美联储为市场提供流动性的方式早已不再受限于银行体系。

击,且面临财富外流,陷入“斯蒂格利茨怪圈”。

1. 国际层面:美元-美债国际环流下金融垄断资本虹吸全球财富

由于美联储通过主要金融机构将新发行的货币注入市场,华尔街成了调配资金的枢纽。这并非本世纪才有的新现象。美国国会 1913 年的一份调查报告便已得出结论:“少数几个金融领袖间建立了一个泾渭分明的利益团体……这导致绝大多数的金钱和信贷正在迅速向这些人手中集中……这些银行家同时也是公共货币市场之外那些放贷银行的代理人与联络人,一小部分人及其同伙与合作者现在通过持有大量股份、在其董事会任职,以及有价值的资助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对这些机构资源的控制。”^①实际上,这份报告是促成《联邦储备法案》(美联储因这个法案而成立)于当年通过的依据之一。虽然《联邦储备法案》规定美联储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必须具备对美国的不同产业、不同地区的代表性,但实际上,这一约束已遭摒弃,联邦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如今几乎都来自金融业(格里芬,[2010]2017, p. 579)。

金融垄断资本通过美元体系虹吸全球财富的现象在美元量化宽松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危机时期,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政策从私人金融机构那里大量买入国债、MBS 和企业债,急剧增发美元。由于美联储是私人银行联合体,所以它交易国债的对象以及购买的数量,无须向公众披露。由于谁先拿到流动性谁就有在价格普涨前购买资产的优势,亦即掌握了资产定价权(张捷,2014, p. 263),美联储的资产购买政策存在巨大的利益输送空间,因而也是博弈的焦点。譬如,2008 年 9 月 14 日,美国第五大投行雷曼兄弟的救助请求遭到了美国政府和华尔街巨头的拒绝。次日,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一周后,时任财长兼前高盛 CEO 保尔森提出了 7000 亿美元金融救助方案,包括向高盛、摩根大通等头部投行注资。这绝非雷曼的运气不佳,而是金融垄断资本内部的利益斗争。由此可见,美元体系存在一种权力和财富的分层:核心层由美联储、财政部和华尔街构成,负责政策制定与执行,这些机构被“一小部分人及其同伙”掌控,决定流动性的分配;中间层由一级交易商和跨国金融机构构成,作为政策传导机制赚取利差收益;外围层由经常账户顺差经济体构成,通过商品和资产输出换取美元债权。

2. 国内层面:超额融资优势下企业经营金融化与工薪阶层返贫

美元-美债国际环流虽然要求美国经常账户持续逆差,但也使美国企业从资本市场的超额融资优势中获益——海外投资机构(如新加坡、中东的主权基金)的美元储备通过股权、证券投资进入美国资本市场,使美国企业获得估值溢

^① 内容出自《1913 年 2 月 28 日普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转引自格里芬([2010]2017, pp. 7-8)。

价。这种超额融资优势是众多美国商业“神话”的根源,包括美国科技公司的创新和高估值神话、私募股权投资的一夜暴富神话、职业经理人的管理学神话等。

超额融资优势带来的弊端是企业经营金融化和工薪阶层贫困化。企业高管在处置盈余时更倾向于股票回购和分红,而不是将其用于企业的再投资。职业经理人掌舵企业运营,工程师被排挤到一边。高管不思打磨提升产品和技术,唯华尔街马首是瞻。这种影响绝不仅限于上市公司,创业公司同样被金融资本渗透。为了能够快速变现,创投资本以人事安排、上市进度等附加条款或对赌协议为条件注资创业公司,杀鸡取卵、鸠占鹊巢式的创业投资案例屡见不鲜(Bracy, 2025, chapter 2)。与企业经营金融化一体两面的是工薪阶层贫困化。企业为实现更高的短期利润和股价,将生产环节转移至海外,国内劳动者就业呈现碎片化和弹性化特征,金融和高科技行业的从业人员、企业高管的收入与普通民众的收入之间呈现“K型”分化态势。

四、币权集中的本质与加密货币的去中心化悖论

当前美元体系下币权垄断格局并非偶然,纵观中外货币史,货币权力的集中化始终内嵌于阶级统治的需求,且受私有制的制约。加密货币以“去中心化”为核心叙事,试图以技术架构的分布式特性消解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历史惯性,这一尝试的结果只能是以新的垄断代替旧的垄断。

(一) 币权集中的动力与阻碍

1. 币权的阶级本质：从价值形式到统治工具

货币权力具有集中化趋势。从市场层面来看,商品交换的价值通约性要求单一的价值尺度。当多种价值尺度并存时,“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将使商品交换市场出现动荡,一般认为,这种动荡难以自发修复。从政治层面来看,货币作为物化了的社会权力,推动阶级统治从暴力强制向经济控制的方向演进。在中国古代,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汉武帝垄断铸币权,其本质都是通过强制手段将经济权力制度化为政治权力,服务于中央集权统治。滥觞于欧洲的现代央行制度和国际货币体系也呈现出相似的演化逻辑——资产阶级及其政府通过逐步统一货币制度,将货币权力逐渐集中至金融资产阶级手中,服务于资本积累。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以是否具有货币(或银行券)垄断发行权作为界定中央银行的核心标准,西方第一家中央银行的雏形出现于1844年:为了让英格兰银行(当时仍是一家私人股份制银行,同时也是英国政府最大的债权人)继续为政府筹措资金,英国议会通过《皮尔条例》,以法律形式确立了英格兰银行在银

行业中的垄断地位,标志着货币权力的质变。

为实现货币统一管理,同时确保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职能的平稳发挥,金融垄断资本不断调适货币及信用创造体系,推动其如毛细血管般嵌入微观经济,形成了“央行—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企业及家庭”的流通网络。资产阶级货币体系的剥削属性隐匿在具体的商品生产与交换关系中,“美元-美债”国际环流正是该剥削属性的典型实现形式。

2. 币权集中的限制:金融资本社会化与私有制的矛盾

同样重要的是,统一货币(例如法币)的推行和使用仍受到其他利益主体的限制。货币职能的运行建立在一定交换范围内交易双方达成的共识之上。尤其当市场扩大后,货币本身的价值已经被符号化,交易者完全基于货币背后所隐含的契约关系使用货币。这意味着一定市场范围内流通的主要货币并不必然是法币,也意味着法币并不必然是最受欢迎的货币。此处以香港地区独特的货币发展史为例(冯邦彦,2024, pp. 54-57)。港英政府在 1845 年便已颁布法令,明确英镑在港的法币地位,以英镑统一政府出纳和税收,并试图通过发钞逐步取代市场上的银币。但直到 1935 年南京国民政府废除银本位制,将白银收归国有,港英政府才终于有能力禁止白银流通,并将港币的发行从银本位调整至英镑汇兑本位。个中原因在于,香港当时虽受英国政府管辖,但其在经贸关系上仍属于中国市场的延伸,民间更愿意用银元(即便是不同国家铸造的银元)交易和纳税。

由此可见,法定货币的权力体现了货币统治阶级的意志,法币流通的范围越广泛,其所代表的价值越是符号化,货币统治阶级从维持法币体系中得到的社会权力也越大。在中国古代,金王朝开创性地通过促进纸币流通,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政权的巩固及兵力的提升(王禹锋和王禹浪,1988);在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中,美元政策变动可能引发他国的金融动荡和资本外逃。但是,统治阶级权力的延伸受到了私有制的限制。因此,在私有制社会,最终形成的是币权的竞争格局。在确立了法币的国家,非法币与法币之间的竞争不一定激烈但一直存在。在国际层面,主权货币之间的竞争表现得尤为突出。“货币冷战”这一术语较好地体现了国家集团之间在货币层面激烈而又隐蔽的竞争关系。

(二) 加密货币的去中心化叙事难掩新型垄断的实质

数字货币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货币载体,根据发行主体、信用基础与功能定位的差异,可将其划分为加密货币和 CBDC。加密货币由私营机构发行,其可细分为无锚定的初代加密货币(以比特币、以太币为代表)与锚定资产的稳定币。

1. 技术架构的去中心化叙事

加密货币依托区块链构建分布式记账网络,其交易信息由全网节点共同验证并存储,无须依赖单一中心机构即可完成价值转移,同时借助非对称加密技术实现账户身份与交易信息的隐私保护,在技术层面构建了“去中心化”的信任机制,实现了低成本的价值流通。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初代加密货币是区块链技术在货币领域的首次实践,其技术架构具有典型的去中心化特征:全网节点共同参与记账,交易信息公开透明且难以篡改。但这类加密货币并无实际价值支撑,其价格完全由市场投机决定,存在价格剧烈波动的缺陷,难以履行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

稳定币是对初代加密货币功能缺陷的技术改良,其核心设计逻辑是通过锚定外部资产平抑价格波动,增强货币属性。按照锚定机制的不同,稳定币可分为抵押型稳定币(通过锚定法币、国债等常规资产甚至加密资产发行,其发行规模与抵押资产价值挂钩,依赖第三方机构进行资产托管与审计)和算法型稳定币(通过智能合约自动调节代币供需实现价格稳定,无须实体资产抵押)。从技术上来看,稳定币既保留了区块链的去中心化与跨境流通便利,又通过锚定机制降低了价格波动幅度,在跨境支付、链上交易等场景中展现出较高的应用价值。

2. 资本规训下的新型垄断实质

然而,加密货币技术的“去中心化”表象与其背后的权力集中本质构成深刻悖论。区块链技术看似削弱了中心机构的权力,但实际上只是将权力中心从台前转移至幕后。即便公链的底层算法、客户端实现完全开源,绝大多数链上用户仍难以辨别其中是否存在后门,且公链的算力、节点和协议治理也难以实现去中心化(张捷,2023)。更重要的是,去中心化意味着监管缺位,一旦出现违法行为,用户遭受的损失无法追回,最终导致链上生态恶化,成为藏污纳垢的小众平台。因此,区块链网络的进一步推广客观上要求一个中心化角色的存在,例如稳定币发行商。

这种悖论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技术变革的规训——当区块链技术试图通过算法信任替代制度信任时,其运行仍受资本积累的原始欲望支配。正如互联网技术在诞生之初被寄予实现“去中心化”的厚望,最终却催生出平台资本主义新形态,加密货币技术同样面临被金融资本俘获的历史命运。归根结底,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特性并未改变资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算力、算法等新型生产资料成为新的“机器体系形式上的资本”(马克思和恩格斯,1979b, p. 553)。

五、CBDC 重构币权秩序的潜力及美国政策影响

CBDC 与加密货币的技术架构可能存在交集,但在设计与运行逻辑上存在本质区别。CBDC 由官方发行,是央行的直接负债,是法币的数字化形态。依托货币载体创新和配套制度改革,CBDC 为打破美元体系下币权私人垄断格局提供了技术路径。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的 CBDC 实践不乏创新之处,但普遍面临制度适配性挑战,且短期内将受到美元稳定币政策冲击。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数字货币政策的转向虽在短期内为美元霸权注入动能,却加剧了其体系内在矛盾,反而为各国依托 CBDC 重构币权秩序创造了潜在空间。

(一) CBDC 为变革币权私人垄断现状提供技术可能

与加密货币普遍采用去中心化底层架构不同,目前全球范围内 CBDC 的底层技术尚未形成主流方案。分布式账本技术自然是很多国家首先考虑的方案,但在合规性、吞吐量等方面存在不足。部分国家探索集中式记账与分布式账本技术相混合的架构,试图融合中心化和分布式的优点,平衡安全与效率,确保央行对其发行、流通和监管的全过程可控。在支付方式上,CBDC 不仅支持基于账户的交易,还支持基于代币的交易,两种方式的结合能够形成功能互补、场景全覆盖的双层优势体系。在运营体系上,CBDC 通常注重与现有金融体系的兼容。虽然分布式账本技术的实时结算功能使商业银行等结算平台变得不再必需,但各国央行仍需要商业银行在用户触达、数字钱包开发等方面创造价值,“央行—商业银行”的双层运营方案受到越来越多央行的认可。CBDC 的技术特性有望使货币主权在国际国内层面实现双重强化。

在国际层面,CBDC 为跨境支付结算带来全新方案,但其意义远不止跨境支付体系的更新。如前所述,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下,非美元国家之间的结算往往也需要挂钩美元,甚至直接用美元结算,这种隐性约束直接或间接地刺激了非美元国家储备美元的动机。此外,目前主流的跨境支付代理行模式需要解决不同司法辖区下两家商业银行之间的信任问题,增加了商业银行的对手方风险和外汇风险,也刺激了将美元作为中介的动机。而借助区块链网络将不同国家的 CBDC 互联互通的跨境支付方案(亦即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 Multi-CBDC Bridge,简称 mBridge)可以实现央行之间的实时汇兑清算,不仅大幅提升跨境支付效率,也削弱了美元的中介地位(周莉萍,2025)。

在国内层面,CBDC 的可编程性和可追溯性使央行获得了更精准的货币调控能力。CBDC 的可编程性允许央行在货币发行时嵌入特定规则,实现货币政

策的精准传导:一方面,通过设定资金使用场景、持有期限等参数,央行可将流动性直接定向输送至中小企业、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避免金融中介的资金错配;另一方面,借助实时交易数据监测,央行能够动态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例如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的经济热度,灵活调整货币流通速率与交易成本,实现“精准滴灌”而非“大水漫灌”。更具颠覆性的是“货币财政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当 CBDC 与税收系统、社会保障系统对接后,财政资金的定向投放将与货币政策深度融合。这种技术融合可能催生出数字货币时代的新型铸币税:通过设定数字货币持有期限、交易限额等参数,央行直接在技术层面实现财富再分配。

(二) 全球主要经济体 CBDC 的实践特征与共性瓶颈

目前,绝大多数国家对 CBDC 持正面态度,尤其是一些金融体系欠发达、黑灰产猖獗、曾经历法币危机的国家对发展 CBDC 具有强烈意愿。但目前国际社会尚未形成 CBDC 的典型或标准实施方案,一些小型经济体的 CBDC 项目虽能较快落地,却因技术缺陷和治理不善而惨淡收场。下文简要评介主要经济体的数字货币发展现状及共性问题。

我国是全球最早推进 CBDC 规模化试点的主要经济体之一,在技术积累、生态建设等方面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数字人民币基于联盟链,采用“一币两库三中心”架构,在确保央行掌握规则制定权与全量交易数据的同时,有效避免对传统金融体系造成冲击。在零售消费、政务服务、普惠金融等多元场景的试点应用中,数字人民币的离线支付、可控匿名等优势,为老年人、偏远地区人群等提供了更加便捷、安全的支付选择,填补了移动支付服务在这些领域的空白,彰显了其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巨大潜力。然而,国内移动支付普及率高,数字人民币在零售场景下的优势并不突出。例如 2026 年之前数字人民币不能用于生息或借贷,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在推广数字人民币时的激励不足,导致整体使用率不高,未能形成网络效应。

其他新兴经济体对于 CBDC 的态度也较为积极主动,希望借助 CBDC 补齐货币主权、金融体系等方面的短板。俄罗斯于 2023 年 8 月启动数字卢布试点,其将数字卢布定位于“支付和转账工具”。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俄罗斯为数字卢布的跨境支付应用赋予了明确的战略意图——保障金融主权,应对西方制裁。俄罗斯已经颁布法律,计划在 2028 年 9 月之前分阶段强制企业与银行接受数字卢布^①,这一部署体现出俄罗斯对 CBDC 战略价值的肯定。巴西的移动支付普

^① 详见俄央行官网消息 <https://cbr.ru/eng/press/event/?id=25774#highlight=2027%7Cdigital%7Cruuble>。

及率较高,其在发行 CBDC 的计划上也颇具雄心。巴西政府希望通过数字雷亚尔(官方命名为 Drex)推动巴西金融体系的进一步数字化,以提升金融效率、促进金融包容性。Drex 已经完成了初步的技术验证和资产代币化场景试点^①。

发达经济体(如 G7)围绕 CBDC 的政策讨论热度较高,但在推进试点上更为谨慎,且明显带有维护既有币权优势的倾向:它们倾向于先推进批发型 CBDC 的研究和试验,截至 2025 年鲜见有关零售型 CBDC 的规模化试点。批发型 CBDC 主要用于银行间的大额支付和跨境结算,对发达经济体而言,其推广除了不影响普通民众的支付习惯外,主要有两点好处。其一,可依托批发型 CBDC 优化现有跨境支付效率,由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长期占据全球支付份额的前四位,相关经济体可借此摊薄开发成本。其二,可提前布局全球数字货币的规则制定,维护它们作为金融资本中心国相对于外围产业国、资源国的财富分配优势。

综合来看,尽管各国在技术方案、实践路径上存在差异,但也面临一些共性瓶颈,这些瓶颈致使各国未能突破既有币权垄断框架下的利益束缚,CBDC 重构币权秩序的潜力难以释放。现有 CBDC 试点多局限于零售、政务等较简单的场景,在批发结算、跨境贸易融资、大宗商品计价等核心金融场景中缺乏突破,难以撼动美元定价权的财富虹吸机制。这一现状折射出相关制度改革的艰难——围绕 CBDC 的法律规定、权责划分、监管框架等配套制度迟迟未能完善,限制了它的进一步推广。类似地,跨境规则的碎片化削弱了反货币霸权合力,致使多边合作仍限于小范围试点,未能形成统一的跨境互通框架,无法形成替代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突破美元跨境支付垄断的统一体系,即便在美国赤字继续扩大的环境下,海外投资者仍被迫逐年增持美债(张明和王瑶,2025)。此外,受美国数字货币政策转向的影响,一些主要经济体的 CBDC 发展在 2025 年遭遇强劲逆风,各国在币权争夺中再次陷入被动。

(三) 美国数字货币政策转向及其对美元霸权的双重影响

CBDC 本身是一种技术工具,其重构币权的方向最终取决于国家之间的博弈。虽然其他国家 CBDC 的发展可能削弱甚至突破美元的权力垄断,但若美国先行推出数字美元,也可能成为其维护并巩固既有秩序的手段(例如,依托技术优化巩固美元跨境支付的核心地位,通过实时交易监控强化金融制裁的精准度等)。美国精英阶层自然是美元霸权的受益者和支持者,但在具体政策上往往存在分歧,尤其在当前社会撕裂、两党对立的氛围下,美国在数字货币政策取向

^① 详见巴西媒体采访报道 <https://valorinternational.globo.com/markets/news/2025/08/08/central-bank-drops-blockchain-for-next-phase-of-drex.ghtml>。

上出现根本性转向也就不足为奇。

拜登政府曾颁布行政令,意图通过主动作为抢占 CBDC 及数字金融的制高点,以“维持和巩固美元霸权,应对其他国家 CBDC 的挑战”(蔡晓月,2025)。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对数字资产、加密货币持反对立场,却在第二任期上任伊始便签署行政令禁止在美国境内发行或使用 CBDC,同时支持数字资产、区块链及相关技术的发展和使用,放松对加密货币的监管。直至 2025 年 7 月,特朗普签署《指导与建立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法案》(简称《天才法案》),美国首次从法律层面明确了对数字货币、数字资产的发展规划。特朗普政府宣称 CBDC 会威胁个人隐私和金融稳定,并希望将美国打造为全球加密货币的中心。

短期来看,在美元外汇储备份额连续 10 年下跌后,美元稳定币合法化无疑为美元霸权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其一,《天才法案》作为主要经济体中的首部加密货币法律,推升了全球对于加密货币尤其是稳定币的关注度,也提升了美元稳定币的渗透率。其二,该法案明确要求,发行商每发行 1 美元稳定币必须储备 1 美元现金或短期美债,不仅拓展了美元和美债的使用范围,同时也侵蚀了其他法币的市场份额。其三,美元稳定币的跨境流通便利性,强化了美元在数字经济、跨境贸易等场景中的使用惯性,巩固了美元霸权。

然而,这种饮鸩止渴式政策,本质是将美元体系的内在矛盾从传统领域拓展至数字资产领域,长期来看将加剧金融风险的累积与爆发,对美元霸权构成更深层次的侵蚀。首先,由于稳定币发行的潜在收益巨大,数字资产及加密货币监管的草率松绑,必然引发行业各环节的炒作和投机行为,且由于监管方在信息、技术和激励等方面的劣势,最终极有可能出现监管失控和稳定币挤兑,这种风险在当前美国资产普遍高估、政坛腐败分裂的背景下尤为突出。更恶劣的是,美国政府借助虚拟的数字资产支撑美元扩表,同时赋予私人资本更多不受监管的发钞权,将使债务积累与财富集中的恶性循环愈发严峻,致使货币、金融和经济领域的多重风险持续积累,为美元体系埋下更大的隐患。

尾论 以技术理性与制度创新的辩证统一推进 CBDC 治理

当代国际货币体系的持续失衡,核心症结在于美元垄断国际金融基础设施及规则体系,扭曲全球价值分配。眼下,失衡正滑向失控:美债加速积累,美联储提前扩表,加密泡沫濒临破灭,美国经济愈加虚拟化、投机化,其内部危机正在多维度外溢全球。然而,危机孕育机遇。面对这一格局,中国需坚持内外协同推进 CBDC 治理:对内,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通过强化国家对金融资本的统筹管控,引导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以数字货币技术赋能公平分配与共

同富裕;对外,充分发挥全球最大工业国和最大贸易国的优势,逐步构建自主可控的跨境金融基础设施,争取大宗商品定价权,削弱美元的垄断权力。尤其在当前全球 CBDC 标准缺失、多边协调不完善的阶段,更应优先夯实国内制度基础,打造可复制的实践样板,为全球数字货币治理提供兼具社会主义属性与实操价值的中国方案,坚决规避资本主义央行制度的路径依赖,防止重蹈美元霸权的历史覆辙。

其一,以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方式,建立公有制主导的数字人民币关键基础设施。CBDC 的运转离不开对网络架构、数据处理、算力供应、数字钱包等模块的统筹安排。可建设国家级公链平台,将数字人民币及其他公共服务在链上开源治理,使智能合约规则制定过程公开透明,接受社会审计。数据模块具有显著的规模效应且涉及公共安全,算力模块的建设成本高,均可考虑参照“东数西算”工程,开展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划(黄尹旭,2024)。应降低数字钱包等应用层的行业准入门槛,削弱应用市场的私人垄断势力,为货币权力的集中治理奠定物质基础。

其二,以数字人民币优化价值分配体系,促进全社会共同富裕。CBDC 技术的精细治理潜力使其在促进共同富裕方面可以大有作为。试点疏通普惠金融政策堵点(如中小企业融资、贫困补贴、育儿补贴发放等),将数字人民币发行产生的新型铸币税及数据要素收益反哺社会(马扬等,2023)。试点优化三次分配体系。例如,在平台经济领域,建立劳动贡献与报酬分配的实时匹配模型,为破解数字零工经济中的剥削问题提供技术方案;在税收调节领域,以代码形式落实累进税制,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数字形态结合。

其三,以 mBridge 等现有合作平台为基础,将 CBDC 引入大宗商品贸易、金融资产交易、跨境投融资等复杂金融场景,逐步削弱美元定价垄断,促进国际层面的平等交换。可从中俄、中巴等对 CBDC 合作有基础、有技术、有意愿的经济体着手,稳步推动两国 CBDC 在中小微企业跨境收付、银行间大额结算、跨境贸易融资中的常态化使用,后续逐步扩大至“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东及南美等资源出口地区。基于主要国家的成熟实践牵头制定技术标准和跨境规则,降低 CBDC 开发推行成本,帮助更多国家巩固货币主权。

参考文献

- 蔡晓月. 2025. 特朗普叫停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影响及建议[J]. 清华金融评论, (3): 109-110.
- Cai X Y. 2025. The impact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rump's suspension of

-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CBDC)[J]. *Tsinghua Financial Review*, (3): 109-110. (in Chinese)
- 丁一凡. 2012. 欧元区债务危机背后的国际政治博弈[J]. *国际经济评论*, (2): 74-82, 6.
- Ding Y F. 2012. Eurozone debt crisis and evolu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landscape[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 74-82, 6. (in Chinese)
- 冯邦彦. 2024. 香港金融史(1841—2017)[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 Feng B Y. 2024. Hong Kong financial development (1841—2017) [M]. Shanghai: Oriental Publishing Center. (in Chinese)
- G. 爱德华·格里芬. 2017. 美联储传: 一部现代金融史[M]. 罗伟, 蔡浩宇, 董威琪, 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 (original language) Griffin G E. 2010. The creature from Jekyll Island: a second look at the federal reserve [M]. 5th ed. Westlake Village, CA: American Media.
- 管清友, 张明. 2006. 国际石油交易的计价货币为什么是美元? [J]. *国际经济评论*, (4): 57-60.
- Guan Q Y, Zhang M. 2006. Why is the US dollar the pricing currency for international oil transactions?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4): 57-60. (in Chinese)
- 黄尹旭. 2024. 培育一体化公共数据市场的法律治理转型[J]. *法学评论*, 42(6): 14-22.
- Huang Y X. 2024. Legal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of cultivating integrated public data market[J]. *Law Review*, 42(6): 14-22. (in Chinese)
- 李稻葵. 2011. 世界经济下一轮危机在哪里? [J]. *国际经济评论*. (6): 7-11, 3.
- Li D K. 2011. The coming crisis: a global perspective?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6): 7-11, 3. (in Chinese)
- 马克思, 恩格斯. 196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 恩格斯. 197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 恩格斯. 197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 恩格斯. 1979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 恩格斯. 1979b.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

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马扬,杨东,周鑫.2023.数字人民币促进分配公平的机制分析和制度设计[J].学习与实践,(7):75-84.

Ma Y, Yang D, Zhou X. 2023. Mechanism analysis and system design of E-CNY to promote fair distribution[J]. Study and Practice, (7): 75-84. (in Chinese)

乔万尼·阿里吉.2022.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时代的起源[M].姚乃强,严维明,吴承义,译.北京:三联书店.

(original language) Arrighi G. 2010.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M]. London: Verso.

邵运文,周宇.2024.商品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J].西南金融,(3):19-31.

Shao Y W, Zhou Y. 2024.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d experience of opening up commodity futures markets to the outside world[J]. Southwest Finance, (3): 19-31. (in Chinese)

王湘穗.2009.币权:世界政治的当代枢纽[J].现代国际关系,(7):1-8.

Wang X S. 2009. Monetary power: the contemporary nexus of world politics [J].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7): 1-8. (in Chinese)

王禹锋,王禹浪.1988.金代货币制度初探[J].学习与探索,(3):123-133.

Wang Y F, Wang Y L. 1988.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monetary system of the Jin Dynasty[J]. Study and Exploration, (3): 123-133. (in Chinese)

徐孝明.2010.论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美国对沙特的外交政策[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6(2):132-136.

Xu X M. 2010. 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oward Saudi Arabia after the first oil crisis[J]. Journal of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46(2): 132-136. (in Chinese)

张健.2011.后工业社会的特征研究——基于哲学的视角[J].人文杂志,(4):22-29.

Zhang J. 2011. A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from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J]. 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 (4): 22-29. (in Chinese)

张捷.2014.定价权[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Zhang J. 2014. Pricing power [M]. Beijing: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in Chinese)

张捷.2023.数字泡沫:虚拟经济交易学[M].北京:华文出版社.

- Zhang J. 2023. Digital bubble: the theory of virtual economy transactions[M]. Beijing: Chinese Language Press. (in Chinese)
- 张明, 王瑶. 2025. 从海外投资者结构变化看美国国债风险[J]. 清华金融评论, (12): 27-29.
- Zhang M, Wang Y. 2025. U. S. treasury bond risks: through the lens of changing overseas investor structure[J]. Tsinghua Financial Review, (12): 27-29. (in Chinese)
- 周莉萍. 2025. 技术创新驱动跨境支付多元化发展[J]. 中国金融, (23): 51-52.
- Zhou L P. 2025.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riving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payments[J]. China Finance, (23): 51-52. (in Chinese)
- Bracy C. 2025. World eaters: how venture capital is cannibalizing the economy[M]. New York: Dutton.
- Buiter W H, Sibert A. 2007. The Central Bank as the Market Maker of last Resort: from lender of last resort to market maker of last resort[R]. EliScholar. <https://elischolar.library.yale.edu/ypfs-documents/11434/>.
- Demski J, McCauley R N, McGuire P. 2022. London as a financial centre since Brexit: evidence from the 2022 BIS Triennial Survey[R].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Working Papers.
- Haberly D, Wójcik D. 2015a. Regional blocks and imperial legacies: mapping the global offshore FDI network[J]. Economic Geography, 91(3): 251-280.
- Haberly D, Wójcik D. 2015b. Tax havens and the production of offshore FDI: an empirical analysis[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5(1): 75-101.
- Ivanova M N. 2020. Marx's theory of money: a reappraisal in the light of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J].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52(1): 137-151.

Monopoly of Currency Power and Wealth Concentration under the Monetization of Wealth: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Impact of the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System

LO Dic¹ ZHANG Quan^{1,2}

(1. Lingnan Colleg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2. Qianhai Financial Holdings Co., Ltd., Shenzhen,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monetization of wealth intensifies the alienation

in which “money obscures real labor relations”. The credit-based U. S. dollar system siphons global wealth internationally and exacerbates class polarization domestically through the U. S. “dollar-Treasury bond” circulation. Meanwhile, the decentralization narrative of cryptocurrencies fails to break free from the discipline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instead degenerates into a new form of monopoly.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ur study proceeds along the thread of “laws of historical evolution-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contradictions-futur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irstly, we sort out the evolutionary logic of wealth from products and commodities to money and capital, and reveal how the credit system has become a remedial mechanism for capitalist wealth accumulation. Secondly, we deconstruct the “center-periphery” order of the U. S. dollar system and its crises across institutional, technological, and geopolitical dimensions, while analyzing the class nature of concentrated currency power and the paradox of cryptocurrencies. Finally, we explore the potential of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 (CBDCs) to restructure currency power, examine the bottlenecks in global CBDC practices, and assess the impact of the U. S. policy shift. We argue that CBDCs provide a viable path to break the private monopoly of currency power. Accordingly, we propose a socialist CBDC governance path: leveraging public ownership to lea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using technology to empower common prosperity, and promoting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to break the U. S. dollar pricing monopoly. This path aims to provide a solution for global digital currency governance in the blockchain era that combines socialist attributes with practical value.

Keywords: wealth distribution; currency power; monetary theory;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CBDC)